

## 功能解释与“分析的马克思主义”

崔 之 元

在当代西方针对社会科学而创立的“科学哲学”中，以柯恩（英国牛津大学哲学教授）、埃尔斯特（挪威奥斯陆大学社会研究所教授）和罗墨（美国加州大学经济学教授）为主要代表，形成了一个强有力的学派。尽管他们之间在具体观点上差别很大，但他们都共同强调社会科学研究需要寻求微观基础（或称“方法论的个人主义”），强调马克思主义应与当代的先进科学方法（如博弈论和数理逻辑）相结合。从1985年开始，他们一起主编了《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理论的研究》丛书，由剑桥大学出版。1986年，他们三人的论文合集《分析的马克思主义》作为丛书之一问世。尽管“分析的马克思主义”一词容易令人联想到“分析哲学”，但它的实质内容比“分析哲学”远为开放和深入；它唯一的特征只是要求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加强科学性和严密性，应用当代水平的人类知识财富在崭新的条件下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因此，对于我们实现社会科学研究的现代化来说，“科学哲学”是很值得研究和借鉴的。本文试就其中埃尔斯特的“解释哲学”及其对于功能解释的研究作一介绍。

### 一、功能解释：一般阐述

根据埃尔斯特的解释哲学，功能解释是结果解释的一个子类。它用社会现象的实际结果来解释社会现象，而不同于原因解释和意图解释。功能解释的特点，是运用某社会现象对于某些人或事产生的有益结果，来解释社会现象。

很自然，对功能解释的第一个疑问就是：为什么解释在时间上落后于解释对象呢？唯一的答案只能是：这里的解释对象必为某种行为模式，而非单一事件。于是，通过指出该行为如何在某一时刻产生了维持该行为在下一时刻继续出现的结果，得出对该行为模式的功能解释。

功能解释在当代社会科学中影响很大。帕森斯认为，现代功能主义起源于1922年英国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出版的《西太平洋的亚尔古英雄们》一书。<sup>①</sup>马林诺夫斯基通过研究未开化民族得出结论说：“每一种类型的文明中，每一种风俗、物品、观念和信仰都履行着某种重要的功能，都代表着一个运行中的整体之中的必不可少的部分”。<sup>②</sup>于是，他就同社会功能来解释原始民族的图腾崇拜和一夫多妻制等现象。埃尔斯特认为，马林诺夫斯基的原则是功能主义社会学中的强纲领(strong programme)，可表述为：一切社会现象具有有益的结果（有意或无意的、认识到或未认识到的），这种结果可以解释该社会现象。对此，帕森斯作了进一步的系统阐述，认为既定社会中的各项制度，可以从它们对维持作为整体的社会所作的贡献中得到解释。

但是，自从功能主义开始流传于社会科

<sup>①</sup> T. Parsons, Recent Trends in Structural-Functional Theory, in Contemporary Analytical Theory, edited by D. E. Apter and C. E. Andrian, 1972.

<sup>②</sup> 转引自：G. A. Cohen, Marx's Theory of History, P. 248, Princeton Press, 1978.

学以来,也一直存在着强有力的反对功能主义的思潮。例如,著名科学哲学家亨普尔和著名博弈论学者哈沙依认为功能主义根本不是真正的“假设—推演”理论<sup>①</sup>;还有许多人认为功能主义是保守的,不能解释社会的动态变化,因而功能主义强纲领必须受到限制和削弱。根据社会学大师莫顿的《社会理论和社会结构》和斯汀考比的《构造社会理论》,埃尔斯特综合提出了功能解释获得有效性的充分必要条件。他认为,一项制度或一种行为模式X,能够用它对于群体Z的功能Y来加以解释,其条件是:

(1) Y是X的结果;

(2) Y对于Z有益;

(3) Y不存在于产生X的行动者的意图之中;

(4) Y——或至少X与Y之间的因果关系——不为Z中的行动者所认识;

(5) Y用通过Z的因果反馈回路维持X。

埃尔斯特认为,在社会科学中只有很少的功能解释可同时满足上述五个条件,因而有效的和成功的。其中最著名的例子是芝加哥学派的经济学家对于企业行为的解释:一方面,企业的外部可观察行为,如要素组合和产出水平的选择,似乎表明企业采取了利润极大化的姿态,以根据市场情况进行最优调节;但另一方面,对于企业内部决策过程的研究表明,企业并非受利润极大化目标的导引,而是采用某些粗略的经验规则进行决策。如何解释这两方面的不协调呢?芝加哥学派认为,某些企业偶然采用了利润极大化行为规则,而另一些企业没有这么做;前者通过模仿和吞并形成了企业行为的经验规则,而后者则被市场竞争所淘汰。于是,如果我们视X为企业决策的经验规则,Y为利润极大化,Z为相应的企业,那么X、Y和Z的关系就完全满足上述五个条件,构成一个成功的功能解释。然而,社会科学中现有的大多数功能解释都达不到这一点。埃尔斯

特把功能解释区分为朴素的和精致的两种。所谓朴素的功能解释,就是认为条件(1)、(3)、(4)的成立自动保证条件(2)和(5)的成立,即指出有益的结果就是充分的解释。显然,这种朴素功能主义是极端不能令人满意的。它不仅忽视了有益的结果可能是偶然事故,因而不具有解释力量;而且忽视了解释对象和有益结果可能是第三个变量的联合效果(joint effects)。至于精致的功能主义,就是莫顿所代表的观点,认为条件(1)—(4)的满足自动保证条件(5)的成立。这实际上是把生物学中的功能解释——自然选择的一般机制搬到社会科学中来。但是,社会中并没有对应于自然选择的一般机制,能够允许我们断言社会各项制度的隐功能(latent function)总是通过反馈来维持该制度的。其根本原因在于生物的“功能适应”是一种局部极大化行为,但人类具有全局极大化的能力和“退一步、进两步”的策略行为,因而功能解释不能无条件地在社会科学中运用。<sup>②</sup>

## 二、功能解释:马克思的思想倾向之一

马克思的思想中,有许多精采的、能够与现代最先进科学成就相衔接的因素(见下文)。但是,由于思想史和个人心理的局限,马克思思想中有一种简单地使用朴素的功能解释的倾向。它既不符合上述功能解释有效性的(1)—(5)条件,也不符合(1)—(4)条件,而只是朴素地以某行为模式的结果或功能作为该模式的解释。下面是几个例证。

### 1. 工会斗争问题。

工会的经济斗争是非常复杂的现象,对它的认真解释需要研究集体行动的微观基础

<sup>①</sup> C.G.Hempel, *Aspects of Scientific Explanation* New York, 1965.

J.C.Harsanyi, *Rational-Choice Moders of Political Bihavior vs. Functionalist and Conformist Theorils*, *World Politics*, Jnly 1969.

<sup>②</sup> 以上均见Jon Elster, *Ulysses And The Sirens*, Chapter 1, Cambridge Press, 1979.

(如单个工人何为参加工会? 什么条件下工人才参加罢工?)。但是, 马克思却没有在微观水平上提出问题, 他只提供了一种对工会行动的朴素的功能解释: 工会的经济斗争是加强工人阶级的政治意识的必要条件(即某种功能)。他写道:

“工会的直接任务仅仅是适应日常的需要, 力图阻止资本的不断进攻, ……工会的这种活动不仅是合法的, 而且是必要的, ……工会已经不知不觉地变成了工人阶级的组织中心, 正如同中世纪的市政局和公社是资产阶级的组织中心一样。如果说工会对于进行劳资之间的游击式的斗争是必需的, 那么它们作为消灭雇佣劳动制度本身和消灭资本权力的一种有组织的力量就更为重要了。”<sup>①</sup>

实际上, 由于思辨历史哲学的影响, 马克思往往只是用某一历史事件对于实现共产主义的功能来解释该事件,<sup>②</sup>至于这一事件本身究竟是如何发生的, 则没有详细论述。这就给我们当代的马克思主义者留下了艰巨的任务。

### 2. 内部分裂问题。

工人阶级的内部分裂显然对于资产阶级是有利的, 但这种有利的结果(或功能)能否用来解释内部分裂呢? 马克思关于爱尔兰问题的一封信对此作了回答:

“普通的英国工人憎恨爱尔兰工人, 把他们看作会使自己的生活水平降低的竞争者。……他们对爱尔兰工人怀着宗教、社会和民族的偏见。他们对待爱尔兰工人的态度大致象以前美国各蓄奴州的白种贫民对待黑人的态度。而爱尔兰工人则以同样的态度加倍地报复英国工人。……报刊、教堂讲坛、滑稽书刊, 总之, 统治阶级所掌握的一切工具则人为地保持和加深这种对立。这种对立就是英国工人阶级虽有自己的组织但没有力量的秘密所在。”<sup>③</sup>

在马克思这段话里, 前半部分正确地指出了英国工人对爱尔兰工人的偏见是来自内

在的原因, 但后半部分把统治阶级“人为地保持”也归入工人阶级内部分裂的原因, 则是一种朴素的功能解释。实际上, 统治阶级只能利用而不能创造这种偏见和分裂。马克思不能相信统治阶级从工人阶级内部分裂中得到的好处是偶然的, 因而要使这种功能具有解释力量, 这恰恰显示了他思想中的功能主义倾向。

### 3. 国家理论问题。

马克思在1850年以前认为, 国家是阶级统治的工具, “资产阶级国家不过是资产阶级用来对付它的个别成员和被剥削阶级的相互保险的公司”<sup>④</sup>。在1850年以后, 马克思认识到国家的行动有相当的独立自主性, 不能仅仅用“工具”来解释。然而, 在马克思看来, 国家的独立自主性本身可以用它对资产阶级的长期益处(功能)来解释。他写道:

“既然资产阶级把它从前当作‘自由主义’颂扬的东西指责为‘社会主义’, 那它就是承认它本身的利益迫使它逃避自身统治的危险; ……只有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在政治上同其他阶级一样低下, 个别资产者才能继续剥削其他阶级, 安逸地享受财产、家庭、宗教和秩序的福利; 要挽救它的钱包, 必须把它头上的王冠摘下, 而把保护它的剑象达摩克利斯的剑一样悬在它自己的头上。”<sup>⑤</sup>

由于不能给集体行动者赋予同个人一样的理性(如博弈论的大量研究所表明的), 应该说, 马克思的上述论断是典型的功能解释。国家政策的相对独立自主性, 虽然在短期内可能与资产阶级的利益相冲突, 但它缓和了阶级对立, 从而在长期内对资产阶级有利。然而, 仅仅指出这种功能, 是不足以作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 第220页。

② 例如对于资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革命中的作用的功能解释。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 第656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 第338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 第166—167页。

为对国家政策的自主性的解释的。尤其在当代西方资本主义的新情况下，国家的行为更趋复杂，需要我们对之做出深入细致的研究，而不是采用朴素的功能解释。

### 三、亚意图解释·意图解释·超意图解释

尽管马克思的思想中混杂着功能解释的因素，但这并不能掩盖他的伟大及其思想的现代意义。关键在于，他还（隐含地）提出了对社会现象的三个层次的解释，即亚意图因果解释—意图解释—超意图因果解释，这是可与当代最先进的科学成就相衔接的。

所谓亚意图解释，就是对于偏好和信念的形成机制的因果解释(sub-intentional causality)。人并不是完全随心所欲的，有些内心的和社会的状态只能作为“副产品”而出现，例如无论你多么想入眠，但若不困就是睡不着。人所面临的可能性（约束条件）本身也在相当程度上塑造着人的偏好和信念。现代心理学表明，人有一种消减认知不协调(cognitive dissonance)的内在倾向。一个人可能对自己的境遇不满，但也可能把自己的偏好调整到和境遇相符的水平，进而认为自己的命运是必然的。马克思指出，在阶级社会中，被剥削阶级的偏好往往被塑造为接受自己不可避免的命运。这就是埃尔斯特所说的“酸葡萄”<sup>①</sup>——由外部社会阶级地位和内部消减认知不协调的心理机制所共同形成的偏好。偏好形成机制已成为本世纪七十年代以来经济学和心理学探讨的前沿课题，马克思在这方面可以说是开了先河的。

马克思虽然认为个人的偏好受亚意图因果性的制约，但他不是机械决定论者，他认为人在约束条件下有着选择的自由。这就需要运用意图解释。马克思在1857—1858年的经济学手稿中指出，对单个资本家而言，除了他本厂工人之外的工人全体，并不是作为工人而是作为消费者存在的。因此，马克思不仅认为劳动力价格是生活必需品的价格，

而且承认消费者主权和选择自由。在分析政治现象时，马克思还做过许多精采的策略分析（参见《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等著作）。这都不仅是意图解释的例证，而且可以和现代博弈论衔接起来。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曾谈到“理性的狡猾”，恩格斯曾多次谈到无数人行动的合力的平行四边形造成了与每个人原初意图不同的结果——这就是所谓超意图因果性(supra-intentional causality)。埃尔斯特认为，超意图因果解释就是矛盾分析。矛盾并不是无所不包的，也不仅仅意味着对立和冲突；矛盾的精确含义一定要和逻辑的和行为的自相矛盾有关。例如，罗宾逊夫人认为“资本主义的基本悖论”是：每个资本家都想让本厂工人的工资降低，以便获得更大利润；同时又都想让别的厂工人的工资提高，以便有更大的购买力来买他的产品。其结果必是社会有效需求的降低，致使每个资本家的利润都减少。又如，萨特在《辩证理性批判》中说，每个农夫都企图通过砍伐树木以获得更多的耕地，而大家都这样做的结果却造成了土壤流失，反使他们每人的耕地更少了。这都是超意图因果性的典型例证。而超意图因果解释被公认为是马克思最早系统地使用的，是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中最重要的长处。

如果说亚意图因果解释和主观唯心论划清了界限，意图解释和机械唯物论划清了界限，那么，超意图因果解释就是从前两项微观解释向宏观解释过渡的桥梁。这一“三个层次”的解释方法，是马克思留给我们现代社会科学的一笔宝贵财富。站在当代知识水平的高度，我们可以用社会学和心理学的研究成果，去发展马克思的亚意图因果解释；用博弈论和数理逻辑，去发展马克思的意图解释和超意图因果解释。通过这样的工作，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一定会得到进一步的光大。

<sup>①</sup> Jon Elster, *Sour Grapes*, Cambridge Press, 1983.